



中国新文学大系
导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
续编导言集

（内部材料）

出版前言

当我们影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希望能编一套《续编》和《三编》，因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只是从一九一七——一九二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总结，《续编》当是第二个“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八），《三编》当是第三个“十年”（一九三八——一九四八），如果能如我们所愿，那末，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致完整了。

当我们想开始编《续编》的时候，第一个问题，资料那里去找？请谁来编？要编一套五六百万字的书，最少要有五六千万字的资料，这太困难了，资料在那里呢！有些地区的资料，不一定可以随便取用；有些地区的资料，可以应用，又恐怕不够；这些困难，不能想像，但是愈困难，想编印这套书的愿望，愈是强烈。后来只有“盲人骑瞎马”，到处乱找，海外朋友，也写信去问，这样搞了几个月，终算有点头绪，最后决定，分在三地——东京、新加坡、香港进行，于是开始汇集资料，选定每册的编者，资料集中寄港，加以整理后，再分寄三地编者编辑，编好后，陆续寄港排版，这工作我们前后做了四年之久，现在已经全部排好，终算松了一口气，本来每册编者姓名，应该分别刊出，以示郑重，但今时今地，似乎还是不刊为宜，但有一点可向读者交代的，所有编者都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对新文学有一定的造诣，读者

看了几篇《导言》，即可略知一二了。

现在已是出版前夕，我们最后再看一次校样，准备付印了，心中充满了兴奋和不安：兴奋的是，这件困难的工作，终算完全给克服了；不安的是很多选文的作者，都有着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环境，和四年前大不相同了，这是非我们所能预料的。

所以最后我们这样说，我们今日出版这套书，充满着勇气，也许算是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二个“十年”总结的整理工作，尽过一点力量，也是一些交代。至于《三编》的出版，能否如我们的愿望，那简直是不敢想像了。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1)
总 序	(1)
《文学论争集》导言	(36)
附参考书目	(121)
附目录	(123)
《小说一集》导言	(129)
附目录	(165)
《小说二集》导言	(169)
附目录	(195)
《小说三集》导言	(198)
附目录	(227)
《散文一集》导言	(230)
附目录	(286)
《散文二集》导言	(294)
附目录	(320)
《散文三集》导言	(327)
附目录	(353)
《诗 集》导言	(360)
附目录	(436)
《戏剧集》导言	(447)
附目录	(493)
《电影集》导言	(495)
附目录	(544)

总 序

谭诗园

—

《中国新文学大系》上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它清楚地记录着许多文学先辈们，在经过与封建文学的许多艰苦搏斗之后，终于打碎其枷锁，以新文学取其正统地位而代之的过程。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明朗地照彻着整个文坛，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宝贵的启示。

新文学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参加者的出身及所受之教育，认识各有不同，自然各人的贡献就有大小，对于参加这神圣工作的目的或观点也就难免有不一致，因而使新文学运动发展到后来在力量上引起分化，出现了无可避免的困难。尽管如此，先辈们的基本出发点和奋斗精神，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其中最重要之点，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接受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对近代欧美之科学文明也有相当的认识，而中国封建文化长期以来予人的毒害，他们也曾深受其苦。在这些因素下，加上他们良知上的自觉，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这样，他们就将传统的优良文化精神带进新文学的领域，使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能以我国数千年文化积累

下来的可贵传统作为其灵魂，以与时代共呼吸的精神作为其外貌，又以反对封建制度所庇护之一切黑暗势力而为行动的目标。由于这些因素，中国新文学才能奇迹一般，在短短的年月之中，取代封建文学盘踞数千年的地位。因此，先辈们所作的承先启后之贡献，是值得我们纪念和景仰的。

我们翻阅先辈们的著作，可以看到贯串于其中的主线，是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这一主线上溯，我们可以发现它数千年来即已潜藏于文学之中。原来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以现实主义为其发展的主流。中国的文化自周代到鸦片战争这一长时期中，一直都是受着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复杂变化而推动着前进，同时又从外来民族的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就是在这两项重要客观条件下，中华民族曾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从文学方面来说，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就是最具体的证明；例如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屈原、司马迁、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等，还有其它丰富的民间文学，如汉魏乐府诗，敦煌的变文，宋元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鼓词、弹词、民歌、传说、地方戏等等，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是各具其鲜明特色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这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的传递而为新文学所继承和发展，使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并以现实主义为主流而获得迅速的发展。

在致力于建设现实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辈们当中，贡献最大的首先要数鲁迅。因为新文学运动展开以后不久，

当时几位重要的发起人、领导者，由于各人的思想不同，后来就改变了奋斗的目标。譬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后来就放下了文学而热心于政治宣传去了；又如曾不计一切牺牲而猛冲封建文化堡垒的钱玄同，不久也离开了新文学战线，回到故纸堆中去了；再如以《文学改良刍议》而著名的胡适，后来也抱着强调“一点一滴的解放，具体的问题，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的实验主义态度整理国故去了。只有鲁迅，始终坚持着弃医从文的初衷，不计一切艰难劳苦，默默地从事着新文学播种耕耘的工作；从新文学运动开始，经过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以至离世时止，都没有稍为松懈过片刻。所以在文学界的先辈们当中，只有鲁迅留下的成果最为丰富，最为坚实。不止如此，他对后进的文学青年也是关怀备致，时加提携指导；对于培养文坛的新生力军常穷其精力，许多文学青年就是受到他的指引、帮助而走上了文学道路，成为出色的作家，对新文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从这些方面来看，是没有任何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可与他相比的，所以他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发展，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

至于醉心于宣扬、赞颂西方近代文明的胡适，他早期的活动和若干言论，如当炽热的革命思潮泛滥全国的时候，他却说该打倒的“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虽然这些都是该打倒的不合理现象，但与当时广大民众的激烈的、更彻底的要求是有着相当的距离；他甚至还主张“自觉的改革”，这自然是他天真的幻想，更甚者就是他劝告青年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于这些不很适应于现实的思想，引起许多论者对他作严厉的批评，

甚至对他所曾致力过的文学工作的若干方面作完全否定者，也大有人在。尤其是晚年时，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长，以这样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国际性的集会上，发表贬抑、侮蔑中国文化和民族的言论，这自然更是招至各方面的反对和指责。虽然如此，他早期参予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若干努力，比如从形式上着眼去鼓吹文体的解放，为当时文学的动向而提出过“八事”，以《尝试集》去尝试、提倡白话诗的写作；虽然不彻底，但到底也曾参加攻击“腐败家庭”、“死板板”的法律、迷信、旧道德、政客以及“孔家店”等等，从上述各方面来说，他虽然不是创始者或先行者，但不可否认的，这也总算是他对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作过努力，而且数十年来也为不少人所接受，有着他的同路人及追随者，因而也有着相当的影响。较为显见的事实是，对于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态度和观点，受胡适的见解所影响的颇多。如今，胡适已作古了，对于他在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活动，是功是罪，研究者们可根据个人的观点，赞扬或贬抑尽管各自由之，但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首要的条件是在于它能与时代的脚步一致，能适应当时社会大众的共同要求。第一个“十年”时期，当时社会大众的总的要求是反对封建制度，粉碎一切不合理的黑暗现象，当时的文学作品，就是充满鲜明的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虽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作家们所受的教养各有不同，思想认识有深浅之别；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积极性就有着不同程度的分别。

以诗歌来说，胡适的《尝试集》，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鉴别，自然觉得它很幼稚。但是在当时因诗词的形式和格律，还普遍是一般人心目中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时，他敢于作这种“离经叛道”的“尝试”，这到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胡适在《尝试集》中所能作到的，虽还只限于形式上，很少接触到诗所需要之内容上的革新，但他能不为传统、因袭观念所束缚，这也显示出了在冲破封建文学的形式方面，他着实具有挑战者的勇敢精神。当然，刘半农对新诗的贡献，不论是形式或内容，都大大超越了胡适，不过，他的第一本诗集《扬鞭集》的出版时间（一九二六年），比之《尝试集》已晚了六年。从时间或个人文学修养的进度上来说，这正是必然的现象，从这里也可见出文学发展的一点痕迹。

接续出现的诗人们，他们的吟咏中也时常传达出受苦者的声息，很少述说个人的哀怨寂寞，虽然有些人较为偏爱自然风物的描绘，如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俞平伯的《冬夜》、《西还》等，其中也表现着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感情，引起人们对自然的怀恋。

在反对封建及社会黑暗势力方面，以小说的表现最为积极，其中又以鲁迅的小说最为深刻有力，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学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如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暴露出数千年来的社会中人吃人的悲惨事实的《狂人日记》，其主题思想就与“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反对“吃人礼教”口号的精神十分一致。又如在《孔乙己》中，同样也深刻的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从主人公孔乙己的悲惨遭遇，令人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无情，以及像丁举人那一类人的行径之可恶。

此外，鲁迅又藉着《故乡》与《阿Q正传》等杰作，带引知识界的视野扩展到农村去，使人同时看到长久以来存在于农村中的严重问题。我们看到勤劳、朴实的闰土，他为贫困的生活折磨得毫无朝气，阴郁地过着日子。他可以说是中国古老农村中的典型人物，他的精神状态也是那时一般农民所共有的。至于闻名中外的阿Q，可以说，鲁迅是把中国各个阶层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弱点，都集于阿Q身上，但表现得更多的是农村中的赤贫者的浮浪性格，要我们正视其缺点，从而勇敢地将深藏于我们灵魂深处的一切弱点洗涤掉。

其他小说家如汪敬熙、杨振声、叶绍钧、许钦文、王鲁彦等，也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勇敢地探索着人生的问题。

在戏剧方面，对理论的探讨较为热烈，其中又较为偏于对中国旧剧的否定；另外是对西洋戏剧的介绍，这方面以介绍反传统和因袭思想的剧作为主，如易卜生的作品；因为这与当时反对旧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相适应的。至于创作方面，因为不易摆脱和旧剧文学的影响，取材于历史的剧作占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其题材意义却仍旧是配合现实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封建的作用。其他取材于现实人生的剧作，技巧虽未成熟，说教的意味也较浓，但对社会人生，特别是恋爱自由问题所作的探讨，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上述文学创作精神的倾向，我们可于许多优秀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看到。因此，也可以印证古今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上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二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到了第二个“十年”时期，社会处于长期的动乱之中，军阀混战割据，内战，加上日本的侵略，使广大民众陷于惊惶不安的境地。而黑暗势力，直接加于文学的压力、阻碍，又日甚一日。文艺工作者们在罪恶势力所张的黑网笼罩下，随时有失去自由，甚至失去性命的危险，稍为有正义感的文学期刊、作品集，都难有立足的机会。总之，中国文学是处于空前的苦难时代，但没有为黑暗势力所窒息，相反的，循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它获得更坚实、更壮大的发展。

时代愈艰难，文学也愈能于发展中显出其与民众共呼吸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纯度，这正是中国文学宝贵的传统之一，这种传统，正是为本时期的文学所继承着，发展着！

这时期的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忙于应付黑暗势力的挑战和迫害，同时也还得与文学界本身存在着的异己者战斗。在文学理论方面所见的现象尤其复杂，多次的争论，就是不断战斗的一个方面。每一次论战的结果，都使文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因谁是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问题，互相攻击，但另一方面又因普罗文艺问题，对鲁迅和茅盾展开攻击，特别是对鲁迅，更是超越了对问题论辩的程度而偏向于人身攻击，画室曾指出：“一大本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由此可见创造社等当时的态度多么蛮横。由于这次论战，间接予中国文学很大的好处，因为受了创造社的“挤”，鲁迅“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把一些文艺理论译介过来，为读者们较为有系统的介绍了一

些外国的科学文艺理论，而为左联的成立和工作实践准备了理论的基础。

为革命文学问题受到攻击，鲁迅和茅盾所作的辩护，他们的意见都是能促进新文学的发展，而不是革命文学的敌人。经过这一场论战，双方都对许多问题获得深入的、明确的理解，文学战线上所存在着的敌友问题，也得到了澄清。

一九三〇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文艺工作者广泛团结的表现。该组织的工作方针包括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扩大文艺运动，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家等等。鲁迅在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这是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指出左联应注意这些事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第二是“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是“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第四是“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

左联存在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譬如当日寇的侵略最猖狂的时刻，左联组织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投入抗日运动中去，以及发动不少作家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对抗击日寇起过很大的作用。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外国先进的文学理论介绍过来；又曾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等不同立场的文学进行论战，推广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对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对于新作

家的培养，成绩更为可观。

左联的一切活动，主要是在鲁迅的领导下进行。尤其是在笔战方面，鲁迅横扫论敌，处处显出他的闯将本色来。当在联成立后的三个月，一部分作家如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举起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帜向左联挑战，鲁迅当即拿他们的本质剖析，并示众一番，指出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等到改革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新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这个流派果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一九三二年，胡秋原和苏汶向左联“要”文艺“自由”，引起一场“文艺自由”的辩论。他们两人在许多篇唱和的文章中，共同强调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可以不替阶级服务，不做阶级的武器。同声反对政治干涉文艺，认为属于“第三种人”的作家都搁了笔，是因为受了左联批评、干涉的缘故。他们又反对左联提倡文学大众化，说左联“左而不作”。他们的结论认为“第三种人”未必做得成，第三种文学却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这种文艺理论，鲁迅、瞿秋白、周起应、冯雪峰等都曾提出批评，但以鲁迅的《论“第三种人”》一文最为精辟，他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至于苏汶所攻击的“连环图画和唱本”，

鲁迅答复道：“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事隔数十年，历史已证明了胡秋原和苏汶的理论是与现实要求脱节的。这次辩论，使左联内部清算了一些左倾机械论以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使以后的发展更为坚实有力。

在对外的笔战方面，左联的组织力表现得很好；但内部对于一些理论，却不是没有歧见的。如关于大众化问题，大众语文问题等，左联就曾展开热烈的辩论。

关于大众化问题，创造社于提倡革命文学时期，已经接触过，不过当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左联时期，一开始就将之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而展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就曾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意义”提出决议，指出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时说：“首先是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大众化。”“而尤在此问题之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强调“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

因为大众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与其他问题都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用什么话写”。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自由辩论时，宋阳和止敬曾略为接触过，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到一九三四年因了反对“文言复兴”，这问题才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反对文言复兴的讨论，引出了大众语的建立和应用问题，讨论下去，就接触到汉字的繁难，这是大众语的障碍，更是文学大众化的根本障碍。这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学

就难真正做到全面的大众化。要解决这一问题，自然要讨论到汉字的存废，而代以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这正如鲁迅所指出：“和提倡文言文的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所谓文学大众化，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普及问题，而语言文字就是形式的中心，无疑是要先接触到的。作为整个“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除了语言之外自然还有其他问题，例如鲁迅在《论旧形式的利用》一文中，就曾把“旧形式之批判的利用”作为解决大众文艺形式的途径之一；但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为工农的意思，这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的基本方向。

左联的成立，虽然团结了不少作家，但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也有不少观点和立场不同的，他们就没有应召站到旗下来，一直都游离于左翼作家联盟之外；后来因为日本的加紧侵略，这群文艺工作者之中的一部分，已感到形势迫人，不团结势无以自救，因此也就有了抗拒侵略的要求。后来左联提出一切文学工作者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于是原来在左联以外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响应号召，纷纷加盟，汇成一股浩荡的抗日巨流。

但关于用什么口号作为行动的标帜？这却引起过一番争论。首先由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继而又有鲁迅和胡风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许多笔墨就在这两个口号之争中消耗了。

其实，这两个口号孰长孰短，似乎是形式上的问题，实际的意义，固然主要是一种文学方针的讨论，但不可否认的也

涉及到宗派主义方面。所以在文学统一战线进行之初，有一部分人发起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另一部分又发表了一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样一来，本来是为要抵抗侵略才提出大联合的要求，反而因此形成了新的对立局面。

然而，由于现实情势的发展和要求，也因为文艺工作者们一致努力，终于克服了宗派主义的影响，由文艺界各方面的主要人物联合发表了一篇《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对立的局面才告结束，文学运动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才奠定；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才是这次因抗日大联合形式上的完成。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我们大致上可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也意识到每一步的发展，都是由于时代的要求；不过因为文艺工作者们有着思想认识深浅之别，使文艺界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的现象，但在现实的影响下，总能导至某些作家与时代之间的矛盾消除，克服困难，担负起时代所付托之使命。这也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而中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规律而发展的。

三

时代飞跃的发展，促成了第二个“十年”时期的新诗，同其他的新文学形式，有着急激的竞相发展。继承着上一时期所特有的反封建精神，新诗在这第二个“十年”时期中所表现的更为强烈。

第二个“十年”时期的大主题是在表现抗日、反侵略以及反封建，大时代付托诗人们的任务比前更艰巨，也因此显出诗人们的精神更焕发。